

战后日美关系的心理文化学解读

张建立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被美军占领初期所形成的美主日从关系,成为战后日美关系的原型。1960年以来,日美谋求发展全面伙伴关系,但美主日从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的“权力”并非形成这种日美关系的唯一动力,在心理文化学看来,日美基本人际状态的差异才是战后日美间亲子模式下从属式依赖关系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国际政治理论 日美关系 亲子模式 心理文化学 基本人际状态

一、战后日美关系的特点

在当今世界各大国关系中,日本与美国或许是最奇特的一对:一方面,日美两国都是经济和科技超级大国。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美国是世界第一,日本1968—2010年居世界第二,现在依然居世界第三;按联合国《包容性财富报告2012》中提出的包容性财富指标进行评估的结果来看,美国的总资本财富约为11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日本的总资本财富约为5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中国约为20万亿美元,排名第三;^①另一方面,日本一直高度依附美国,日美关系一直处于“美主日从”状态,这与二者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尽管战后日美关系经历了一

* 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100732)

① 胡飞雪:《开辟包容性财富创造新境界》,《上海证券报》2012年7月23日,第4版。

些变化,^①但日美关系的“美主日从”特点没有根本改变。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冯昭奎研究员指出的那样,“在日本尚不具备迅速发展独立军事力量的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是在维持日美安保体制现状的前提下,逐步增强‘独自的军事力量’和‘政治自主性’。这意味着日本仍然需要依赖美国,而只要日本在安全等方面继续依赖美国,日美之间在实际上还是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关系,因为自己国家的防卫要靠人家,谈何与人家平起平坐呢?何况,即使在作为日本的‘强项’的经济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以‘日元升值’和经济制裁(适用‘超级301条款’)两手。事实上,仅日元升值这一手就让日本引为自豪的竞争力‘亮了底’,在1995年春甚至使缓慢复苏的日本经济停下了复苏的步伐,这意味着日本即使在经济方面也仍然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②也就是说,所谓“全球伙伴关系”是徒有其名,虽然日本在经济上可为美国构筑世界新秩序提供某些支持,但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军事上,日本还都无法担当起“政治大国”的重任,日美关系实质上还是一种美主日从的从属关系。

当然,日美关系的特点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一些专门研究日美关系变化的学者甚至总结出了日美关系的周期性规律。日本学者五十岚武士在1991年首次提出日美关系存在两个历史周期的论点。美国学者威廉·R.内斯特亦认为日美关系存在两个周期:最初的伙伴关系和最终的竞争对手两大周期,构成迄今为止的美日关系:一是地缘政治的(1853—1945年),二是地缘经济的(1945年至今)。^③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美关系研究专家刘世龙对上述日美关系周期论又做了进一步解析,指出日美关系以1911年为界,可分为近代、现代两个周期。每一周期历时约为一个世纪,具体分为四个发展时期:平等时期、过渡时期、不平等时期和准平等时期。“在2020年以前,日本不大可能成为美国的挑战者。美国是个旧式霸权国,不愿放弃对日主导地位。”^④也就是说日美关系周期论者也承认至今为止日美关系依然是美主日从的相互依赖关系。

对于战后日美关系,学界大多认为小泉纯一郎执政的约五年半期间(2001年4月至2006年9月)是日美最亲密的时期,日美两国政府也都如此宣称,但澳大利亚学者加文·麦考马克却犀利地讽刺说:“美国与‘属国’的关系被双方说成是从未

① 1979年5月2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和美国总统卡特发表的联合声明,曾让一些学者认为这标志着战后日美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两国关系已由过去的“从属”关系,转化为“老大与老二”的战略伙伴关系。参见杨伯江:《日美关系的特征及其中近期走向》,《现代国际关系》1990年第2期。也有学者把1992年1月美日《东京宣言》的签署视为日美关系由从属关系转变为“全球伙伴关系”的标志。参见张宝珍:《评日美伙伴关系》,《经济研究参考》1992年第22期。

② 冯昭奎:《日美关系:从战后到冷战后》,《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

③ 参见[美]威廉·内斯特(William R. Nester):《力量跨越太平洋》,麦克米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页。转引自刘世龙:《日美关系的两个周期》,《日本学刊》2002年第3期。

④ 刘世龙:《日美关系的两个周期》,《日本学刊》2002年第3期。

有过的亲密。但是,这种‘亲密’只意味着日本单方面遵循美国的要求,逐步提高给美国的补贴金以坚挺美元和支持美国所发动的战争,而日本从不会对美国的政策发生影响”,“主权的自我放弃是附庸国心态的先兆”。^①

除了上述基于学术分析而得出的代表性论断外,对战后“美主日从”的日美关系特点还有诸多形象的表述。据2003年2月19日《朝日新闻》记载,时任自民党政策调查会会长的久间章生在被记者问及在伊拉克战争逼近时,日本应该持何立场时回答说:“我认为日本别无选择。毕竟,日本就像美国的一个州。”据2004年9月21日《朝日新闻》记载,著名保守政治家后藤田正晴在去世前曾痛心疾首地写道:“日本已沦为美国的仆从国或者说属国。”有的学者继承此说,称“在日本宪法的前言与第9条被制订之时,日本将成为美国之属国的地位几乎就已被确定。只要这个宪法存在,日本就不会真正实现国家的独立”。^② 2011年,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著书主张日本要对美国说“不”的石原慎太郎,^③又在其新著中称,日本就是美国的“妾国”,“看看至今美国每年强加给日本的《年度改革要求书》的实际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无疑是一直隶属于美国的,就像美国的‘妾’一样的存在,此间,我们作为被圈养者,当然一直没有任何自主可言”。^④也有中国学者认为,以前日本充当的是仰仗美国鼻息的“小妾”角色,如今已逐步升级为“情人”:其军事上的独立性与灵活性大大加强,在承担更多自我防卫责任的同时,日本军力的自由度大大提升。^⑤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林格纳曾形容民主党鸠山由纪夫内阁时代的日美关系是一种“家庭内分居的夫妻”关系。^⑥也有学者将美日关系说成“师生关系”,称“正由于日本挑战美国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得到美国扶植,日美才结成师生关系”。^⑦

综上所述,战后日美关系的本质特点可概括为“从属式依赖”。顾名思义,日美间的依赖关系是一种非对等的依赖,是一种极特殊的从属性依赖关系。目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趋于用权力(实力、力量,英文为 power)解释国家间形成的非对称性依赖的关系,^⑧具体到日本对美国的极度顺从,往往被顺理成章地理解成是美国的权力使然,这也是目前已有的数百篇日美关系研究论文和部分研究著作的大体共识。但日美关系的特点无法完全用权力解释,日本虽然在政治、经济等实力方面逊于美国,但

① [澳]加文·麦考马克:《美国怀抱中的日本》,于占杰、许春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6—7页。

② 藤原正彦『日本人の誇り』文春新書,2011年,64页。

③ 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NO」と言える日本——新日米関係の方策』光文社,1989年。

④ 石原慎太郎『新・墮落論』新潮選書,2011年,49页。

⑤ 三眉:《日美关系:日本从“小妾”变成了“情人”》,《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11月15日,第3版。

⑥ 『「普天間」迷走 きしむ同盟 日米関係は「家庭内別居」』、『産経新聞』2009年11月7日。

⑦ 刘世龙:《日美关系的两个周期》,《日本学刊》2002年第3期。

⑧ 关于“相互依赖”的详细论述,可参阅[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大卫·A. 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肖欢荣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远远没有到足以使日本如此顺从美国的程度。即便承认“权力”是决定国家间关系的主要因素,那么这种外在因素也会因行为体双方的不同特性而有不同表现,这方面的例子在国际政治领域有很多,以越南战争^①、伊拉克战争^②,以及阿富汗战争来说,美国一厢情愿设计输出的政治民主模式在这些国家举步维艰,^③可以说,无论哪一场战争,美国自身及被其拖进战争的发达国家之力量都不可谓不强大,其对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的国家组织体层面的摧毁也都不可谓不彻底,但强权对这些国家的文明体的损伤并不是很大,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没有让美国一厢情愿输出的民主生根,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没有让美国再度尝到当年改造日本的成功之喜悦。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把解释的重点放在了国家的“组织体”层面,而国家还有“文明体”层面,解释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和国家间关系模式,还必须考虑文化和文明因素。当分析转向文化视角时,早年“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学者对日本行为的解释或许仍不过时:“想用命令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美国做不到,任何外国也做不到。不论在哪个被统治国家,这种办法从未成功。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不能强迫一个与其具有不同习惯和观念的国民按照其愿望去生活。”^④实际上,日美60余年来“美主日从”的独特关系,不是美国的权力所能达到的。或许有人会说,造成日美关系这种特点的原因是日本的战败国地位,但同样是战败国的德国,也曾被美国占领和统治,与美国的关系却不具有这样的特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约翰·W.道尔评价战后日美关系时曾指出:“日美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史无前例的,而战后任何其他经验也无法真正与之相比。日本从前的轴心国伙伴德国,在被占领时期由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分而治之,缺乏像美国对日本进行单边控制那样高度集中的关注。而且,德国逃脱了东京投降后的当权人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那救世主式的高涨的热情。对于胜利者来说,占领战败的德国,也不能感受到在日本的异国情调,那完全是一种对异教徒的降伏。毫无疑问,在麦克阿瑟将军看来,是领受基督使命的白人拯救了‘东方’社会。对日本的占领,是殖民主义者妄自尊大的‘白人的义务’之最后的履行。”^⑤因此,至少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权力”并非形成这种关系模式的唯一原因。

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举出当代国际社会中的三种基本文化,即以战争、杀戮为特点的霍布斯文化,以规则、竞争为特点的洛克文化和以合作、友谊为特点的康德文化。笔者认为,战后日美关系似乎无法用这几种文化中的任何

① 梁志明:《越南战争:历史评述与启示:越南抗美战争30周年胜利纪念》,《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6期。

② 田文林、郭襄平:《伊拉克:美国的另一个越南?》,《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3期。

③ 张红:《阿富汗撤军:美国体面得起来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8月13日,第6版。

④ [美]ルース・ベネディクト:『菊と刀—日本文化の型—』,(日)長谷川松治訳、東京:社会思想社1992年、365頁。

⑤ [美]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序言,第5页。

一种来描述。战后日美关系的特征,显然不属于霍布斯文化,因为日美关系已不是敌对关系;不属于洛克文化,因为美国总是规则的制定者,日本只是规则的执行者,日美间并不具有实质性的竞争关系;日美关系也不属于康德文化,因为康德文化中的体系成员关系是平等的,而日美关系完全是美国主导、日本处于从属地位的双边关系。

前述所谓“日本就像美国的一个州”“日本已沦为美国的仆从国或者说属国”“夫妻关系”“情人关系”“家庭内分居的夫妻关系”“师生关系”等说法,都是在以人际关系来比拟日美关系。国家间关系当然不能简单还原为人际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完全不考虑二者的联系,把国家行为体简化为受权力驱动的自利的“经济人”,忽视对国家行为体的行为起重要作用的文化因素,从而无法解释像日美关系这样的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心理文化学注重人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或许能为解释这种特殊性提供启发。心理文化学理论把人理解为一个“社会文化场”,“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和与之相联系的“基本人际状态”,是心理文化学的两个重要概念。所谓“基本人际状态”就是“人的系统”,或可视为人的生存方式。该视角的一个基本预设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家”,是建立在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之上的。既然基本人际状态的类别、各个维度和心理社会均衡机制不同,那么从理论上说,国家的形式、对异文化的看法和对国际关系的认知模式等都有不同,这在实际中会导致不同的心理文化基础,以及相应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如前文所述,比较日本、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在面对美国强权时的不同表现就会发现,基本人际状态的不同,既可令强权完全发挥效用甚至放大强权的权力效果,亦可抵制强权,使其无效。

在心理文化学视野里,所谓“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就转变成了国家行为体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和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归根到底是处理国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具体到日美关系而言,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前述日美关系的“美主日从”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人的“亲子”(oyako)关系类型相一致。上述关于日美关系的种种说法,可以说都是对日本人际关系中亲子模式下的主从关系的不同表述。既然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日美关系的特殊性,那么,引进心理文化学理论的视角或可得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二、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与日美关系

心理文化学用“缘人”概念来表述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这种基本人际状态在日本社会占有优势地位。日本社会可称为“缘人社会”,表述缘人社会主要价值观念体系可称为“缘人主义”。^①

^① 详见尚会鹏:《“缘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日本学刊》2006年第3期。

1. 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特点

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特点是,其最亲密的人际圈子成员并非完全基于血缘资格,还包括基于其他某种机缘(地缘、业缘等)而共同生活在一起的非血缘关系者。而且,这些成员都是按照“缘约原则”^①按等级排列成一个拟血缘的、序列区分明显的集团,人们把本来投注于亲属集团的感情扩展到亲族之外的人、事、物,通过对集团序列中上位者的忠顺来获取安全感。形象地说,日本人的 interpersonal 关系宛如一长链条,每个人是这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从一个环节出发理论上只有两个点与其他环节相连接,一个是上面的一环,一个是下面的一环。个人的安全感主要靠加强这两头的连接取得。对上,要尊崇、服从,同时得到庇护;对下,要保护、支配,同时得到尊崇。日本社会强调这种纵向的人际关系,从而形成精细的序列区分,使日本人具有强烈的等级意识,对自己的位置十分敏感,日本人随着自己所属社会空间的变化,不仅其行为方式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就连其言谈举止的内容也都会相应地变,日本人只有弄清了自己在集团中的位置,才能决定自己的言行。如果序列不明,日本人甚至不知该如何入席就座,也不知该怎样行礼该如何措辞谈话等。在日本人的 interpersonal 关系中,这种明确的“地位差”无处不在,即便强调社会结构的日本学者中根千枝也称:“在资格、身份相同者之间,经常会意识到序列带来的差别,而这种序列的实际存在,对该集团内部的个人来说,由于是人们直接关心的事情,它更容易具有超出职业、身份和职位不同的重要性。事实上,先辈后辈的序列在社会集团内部具有出乎人们预料的作用。”^②

2. “地位差”在人际关系的典型表现是亲子关系

“缘人”基本人际状态下的日本社会集团比较重视其成员间的纵向关系,明确的“地位差”成为日本纵向社会集团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其典型表现就是纵向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本意是指父母与子女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是所有亲属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在日本社会,“亲子”具有特殊的含义和特别的重要性。缘人社会的基本人际状态特点使得日本的亲子关系并不仅限于血缘之亲,还可凭借各种机缘将这种关系扩展到非血缘人际层面。事实上,日语的“亲子”关系,也常被描述为“亲分子分”(oyabun · kobun)关系或者是“亲方子方”(oyakata · kokata)关系。“亲”“亲分”“亲方”,不仅指家庭中的父母,也泛指各种集团的头人、统帅者等像

^① 所谓“缘约原则”,即介于“亲属原则”和“契约原则”之间的原则,它是指一群人为了某一共同的目标,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下采取共同的行动、遵守共同的规定并自发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原则部分根植于亲属组织,因为它体现的某些特点(如等级制、自发性等)反映了日本亲属集团的特点;部分根植于契约,因为个人有选择是否加入亲属集团的意志。详见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台北:南天书局2010年版,第108—109页。

^② [日]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陈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0页。

父母一样的人或构成单位；而“子”“子分”“子方”不仅指子女，也泛指集团的一般成员、下位者等像子女一样的人或构成单位。^①人们在谈到亲子关系时，不仅包含基于血缘联系的父母与子女的人际关系，更多是指一种基于拟血缘的社会性关系，其性质是庇护与效劳、主与从的关系，是一种明显带有地位差和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②如父与子、兄与弟、师父与徒弟、公司老板与职员、黑社会组织中的头目与喽啰等等。中根千枝亦指出，“亲子”这种关系广泛存在于日本人际关系之中，“以‘亲子’为象征的人际关系，不仅在政治家和黑社会的世界里，实际上在有进步思想的人士，被称为文化人的人士、在大学讲授西欧经济或西欧社会课程的教授，或是在最尖端技术的大企业里工作的人们中也能看到。这个根深蒂固的人际关系状况，决不是像人们历来所说的那种‘封建性’的简单关系，又不是用工业化或西欧文化影响便能简单纠正的东西”。^③

维系这个根深蒂固的纵向亲子关系的情感纽带，就是“娇宠”（amae）和“被娇宠”（amaerare）。娇宠理论的提出者土居健郎指出，“娇宠”心理是一种“爱”，它根植于人的爱的本能，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相互爱”（symmetrical love），或称“对象爱”，而是一种“单方面爱”（asymmetrical love），又称“非对象爱”。娇宠心理以“地位差”和“权威”为前提，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依赖，含有“服从权威”的因素。^④不仅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具有“娇宠”的特点，日本社会也是一种能够允许这种心理存在的结构，即日本人在自己所属的集团中相互依赖、相互“娇宠”。可以说，日本的人际关系就是一种相互“娇宠”关系，强调个人服从父母、上司及所有处于上位者，同时从他们那里得到娇宠、爱护和帮助。上位者对下位者拥有权威，同时也从下位者对自己的尊敬、孩子般的依赖中得到满足，并感到自己的责任。而且，上位者有时也像孩子般地依赖下位者。日本人的劳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个人与企业，以及同事之间的关系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日本社会各种活动都贯穿着“娇宠”这根线。因此，土居健郎说：“‘娇宠’不仅是理解日本人精神结构的关键概念，也是了解日本社会结构的关键概念。”^⑤“娇宠”不仅是一种心理状态，同时也是日本人人际关系的模式，其行为表现是依赖、服从。

3. 缘人的心理社会均衡模式与日美关系

当将日本人际关系的这种特点与前述日美关系的特点联系起来思考时，会发现二者有很大的一致性，即日美之间的主从关系与“亲子关系”很相似，或者说日美关系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亲子关系。尚不确切知道二者之间的机制，但有几点

① 鳥越皓之『家と村の社会学 増補版』世界思想社1993年、127—128頁。

② 前掲書、138頁。

③ 〔日〕中根千枝：《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第86—87頁。

④ 尚会鹏：《土居健郎的“娇宠”理论与日本人和日本社会》，《日本学刊》1997年第1期。

⑤ 土居健郎『「甘え」の構造』弘文堂1991年版、23頁。

可以肯定:首先,这种一致性绝非偶然,它不大可能出现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其次,这种一致性无法用“权力”“战败国地位”等解释;再次,日本人的国际关系比日美关系更为根本,如果二者之间有联系,只能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而不是相反。由此或可推测,日本人是按照亲子关系模式来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或至少受其影响。以下尝试从这种一致性上分析日美关系的亲子特点。

就亲属关系中的亲子关系而言,作为“亲”的一方,其功能至少包含三个层面,即生、养、教。对于拟血缘的亲子关系而言,所谓“生”,虽非通过生殖赋予其生命,但“亲”对“子”所做的一切几乎不亚于再度赋予其新生;所谓“养”,即保护无力弱小之“子”,助其成长;所谓“教”,即对“子”进行社会化的功能,使其熟悉社会文化环境,遵守社会文化规则。^① 战后60余年来,美国对日本可谓尽到了“亲”的责任和义务,日本算得上一个听话的“孩子”。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杨栋梁的《日本近现代经济史》,对美国如何对日本发挥作为“亲”的“养”之功能进行了探讨;^② 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加文·麦考马克著《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探讨了美国是如何对日本发挥作为“亲”的“生”与“教化”之功能;^③ 肖伟的《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对美国如何对日本发挥作为“亲”的“保护”之功能进行分析。^④

另有学者通过对美国如何在日本人中培养美国文化精英的分析,指出战后美国对日本实施的软实力战略是形成日本几乎半永久性追随美国的根源。^⑤ 对美国而言,战败后的日本的身份开始由敌人转变为需要美国控制、改造、保护和帮助的对象,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不仅在硬件方面,在软件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1973年至2008年,日本“NHK广播文化研究所”连续35年进行了“日本人的意识”调查。调查问卷总计包括50余项,涉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其中,第45问是“你最喜欢的国家是哪个?请选出一个。”在日本人喜爱的外国国家排名中,35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一直列居日本人喜爱的外国国家之首位,中国基本上是在第7、8、9名徘徊。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已经滑落到了第10名的位置。从受喜爱的百分比程度来看,100个日本人中,表示喜爱美国和中国的比例,基本上是维持在20:1这样一个态势。问卷第46问列出了11个喜爱外国的明确的理由,请接受调查者从中选出最接近的理由。从调查数据结果来看,日本人喜爱外国的理由,既不是单纯依据其与日本是否有外交关系,亦不是依据该国的富有

① 井上健治「子どもにとって親とは何か」、加藤一郎『東京大学公開講座17 親と子』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77—88頁。

② 杨栋梁:《日本近现代经济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

③ [美]约翰·W. 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澳]加文·麦考马克:《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

④ 肖伟:《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⑤ 松田武『戦後日本におけるアメリカのソフト・パワー——半永久的依存の起源』岩波書店,2008年。

程度,而主要是看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优劣,即该国是否拥有令其心悦诚服的优秀的软实力。^① 这些数据也恰好说明,正是因为美国的行为发挥了作为“亲”的功能,符合了作为亲子关系的“亲”方身份,也符合了日本人对“亲”方的期待,所以才得到了作为“子”方的日本人的认同。

在心理文化学看来,日本社会人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亲子关系特点或许与缘人的亲属体系特点——父子关系占优势地位、母子关系占亚优势地位——有关。“权威性是父子关系的主要属性,透过这项属性的培育,父亲与儿子双方都被调整以符合需要。上位者不必掩藏他的权力,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应得的,下位者不需要掩饰他的敬意,因为不必因此感到羞愧。权威和顺从权威的行为因此可被公开地、竭力地施行,双方都不会感到不安。如果上位者变得太有压迫性,也许会产生困扰,但是对于压迫的疏解,在于指认出威胁的个人,而非挑战那产生压迫的整个社会结构。在父子关系优势体系中培养出来的个人,将不会对仁慈的权威感到厌恨,事实上,他们还会拥戴它。”“在母子关系优势社会中,权威必须更加竭力地去履行,而深深依赖那有时是负面的限制,才能使这种形态变得可行。其中可能会出现对于权威的挑战,但是这种挑战将没有什么效果,而且对社会文化很少有真正的影响。”^②

人际关系模式是在无意识层面起作用的,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人才会表现出不仅令美国人也令日本人自己都费解的顺从。这样的例子可以列举很多,且不说战后初期日本对美国态度的180度大转变,^③ 仅以近些年日美之间每年交换的《年度改革要求书》为例,亦可见一斑。《年度改革要求书》正式文件始于2001年,但类似文件早在1994年就已经实施了,对美国每年提出的要求日本基本上是照单接收,当年不能改正的也会为之继续努力,而日本对美国提出的要求,美

① NHK放送文化研究所编『現代日本人の意識構造』[第六版]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5年;NHK放送文化研究所編『現代日本人の意識構造』[第七版]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10年。

② [美]许烺光:《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许烺光著作集》第9卷,许木柱译,台北:南天书局2002年版,第285—286页。

③ 本尼迪克特曾对此描述说:“令人几乎难以置信的是,日本人对战胜国竟如此友好。几乎战争一结束,情况就十分明朗:日本人以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了战败及其一切后果。他们以鞠躬致意,微笑招手,甚至欢呼来欢迎美国人。这些人的表情既不抑郁,也没有发怨。用天皇宣布投降诏书中的话来说,他们已经‘忍所难忍’。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着手重建家园?在占领条件下,他们有这种机会。占领军并没有占领每个村庄,行政事务的管理仍在他们手中。整个民族似乎都在欢笑招手迎接而对自己的事却漠然置之。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在明治初年完成了复兴奇迹,在1930年代倾注全力准备军事征服,他们的士兵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不顾一切,逐岛拼死作战”,“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这算不上道德问题。而我们热衷于‘主义’,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即使失败,我们的信念也不变。战败的欧洲人到处都在组织地下活动。而日本人则除少数极端顽固分子外,不需要组织抵制或在地下反对美国占领军的运动。他们不感到在道义上有坚持旧路线的需要。占领后不到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为安全担心,并且受到曾经是国家主义者官员的有礼貌的接待,未发生过一次报复行为。我们的吉普车通过村子时,孩子们站立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见),婴儿自己不会招手,母亲就把着他的手向美国兵挥动。战败后日本人这种180度的转变,美国人很难理解是真实的。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美]ルース・ベネディクト:『菊と刀—日本文化の型—』,197—200页)

国从来就没有接受过。日本为何会对美国如此俯首帖耳呢？心理文化学者许烺光曾指出：“日本人害怕美国将会离开日本；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美国的支持及权威使他们感到安心。”^①日本的顺从与其说是出于利益考量，莫如说是担心遭到美国的抛弃，因为对于“缘人”而言，日本作为亲子集团中的“子”，若被作为“亲”的美国所抛弃，那将是比任何经济制裁都可怕的事情，其内心的惶恐不难估量，或可以说这种恐惧心理已沉淀为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在民主党实现政权交替后，第一任首相鸠山由纪夫为了日本的自立和自尊，曾想打破过度依赖美国的现状，故鼓起勇气倡导构建“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结果有勇无谋成了短命首相。鸠山由纪夫内阁时代，废除了“日美管制改革委员会”，实际上也就等于停止了《年度改革要求书》的交换，但其后美国仍在其驻日本大使馆网页上登载以“日美经济调和对话”为题的文件，要求日本就一些产业领域进行政策调整和法制改革。很多人认为除了普天间基地搬迁一事惹怒了美国之外，废止《年度改革要求书》的交换，也是导致美国要教训鸠山的重要原因之一。维基网站爆出的美国外交电文显示，日本民主党鸠山内阁短命，与违背美国意愿有很大关系。该则新闻2011年5月4日17时27分在“时事通信”网站上一经报道，即引来了一千余条网络留言，其内容除了对鸠山的信口咒骂和对美国的千恩万谢外，就是对日本周边国家发泄的莫名怨愤。其中，甚至有这样的留言：“美国与中国，如果成为其属国的话，你选择谁？如果有人这样问我，我则毫不犹豫地回答选择美国。”^②上述网络留言所反映出来的极端心态，其实也正是日本人按照亲子模式看待世界的结果。恰如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指出的，日本人信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信念，这是根据其社会经验所培育的生活准则，^③是对其等级制的纵式社会的一种肯定，可以说是一种放大的亲子关系。日本人不仅易于按照亲子模式处理人际关系，也倾向于依此处理国际关系，在战前，他们曾把自己描绘成已高居于国际等级制金字塔的顶端，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一种想象中的以日本亲子关系为架构的秩序，^④战后，日本一厢情愿的大东亚共荣圈梦想虽然破灭了，但日本人按照亲子模式来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行为模式依旧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人承认美国权威处于等级制的最高位置”，^⑤将当下的国际秩序看作是以美国为“亲”的亲子社会。日本前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宣扬的对美国霸权的臣服论，^⑥与上述甘愿做美国之属国的网民心理可谓并无二致。

① [美]许烺光：《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第147页。

② 「東アジア構想『米首脳部に驚き』=キャンベル氏、両国関係の危機警告——公電」、《時事通信》2011年5月4日，<http://headlines.yahoo.co.jp/hl? a=20110504-00000062-jij-int>。

③ [美]ルース・ベネディクト『菊と刀—日本文化の型—』,53—88頁。

④ 游国龙：《序列意识与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

⑤ [美]ルース・ベネディクト『菊と刀—日本文化の型—』,88頁。

⑥ 尚会鹏：《日本人的等级意识：“日本人意识”漫谈之二》，《当代亚太》1996年第4期。

三、美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与日美关系

人际关系不能直接等同于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处理的是活生生的人在共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关系,更容易达成某种默契,国际关系处理的是非人的组织体之间的关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往往缺乏共同的文化背景,彼此的关系也更加错综复杂很难融洽。因此,日美间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种特殊的“相互依赖、美主日从”的关系并得以延续至今,显然并非日本单方面的行为使然,亦必与美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特点有契合之处。因此,我们不能仅满足于考察日本方面,还应同时考察美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特点及其对美国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心态的影响,这样才能全面揭示战后日美关系形成的原因。

心理文化学用“极致个人”概念来表述美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个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以强调人的个体性、弱化人的相互性为特点,在西方社会中占优势地位,并在现代美国社会得到了最完整的表达,发展为一种极致形式,故把美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称为“极致个人”。以“极致个人”为基础的社会称为“极致个人社会”,反映“极致个人”的价值观体系称为“极致个人主义”,它们分别是“个人”“个人社会”和“个人主义”的极致形式。^①

极致个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的主要特点是对人的界定趋于与作为生物体基础的个体完全一致,趋于以个体性呈现的人的本真生存结构来掌握外部世界和自身命运,并把自身感受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甚至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些事物上,这种自我认知模式在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和行为上的表现就是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自我中心倾向。强烈自我中心的自我认知模式,使个体需要采用种种方式来强调“我”与“他者”的区别以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因而又极易产生种族优越感。极致个人最亲密的人际圈子成员缺乏亲属成员之间的恒定、密切联系,多是由一些资格相同者按照契约原则构筑的俱乐部式的集团,成员们追求的东西相似或相同,所以彼此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给个体带来不安全感,致使个体不得不透过各种办法,向内或向外投入极大的心理能量以获得均衡。极致个人具有强烈竞争性的人际关系特点表现在美国外交方面就是,他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以竞争者的眼光对外部的他者世界进行清晰而明确的定位,确定谁是其“敌人”及“竞争对手”——未来可能对美国地位构成挑战的潜在“敌人”,同时,出于其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种族优越感,他还会在外部世界中找出那些他认为地位较低、较落后、需要帮助的人,由此来求得其心理社会的均衡。^②

① 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4—75页。

② 尚会鹏、游国龙:《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第422页。

关于极致个人谋求心理社会均衡的方式及其在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和行为上的表现,许烺光曾论述道:“极致个人主义者受限于自我中心的观念,被教导要以自己的想像去塑造世界。他要超越所有障碍来提升自己。如果需要的话他甚至会忍受从众以达到目的。但是,对于那些地位低的人来说,他则会要求大家符合他的期望。他也许会投入很多精力,非常照顾他们,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并不怕麻烦地改造他们,直到他们俯首称臣,并照他的吩咐去做。对他而言,最无法忍受的事是他认为地位较低的那些人要求与他平等,更糟的是实际上要凌驾于他之上。由于极致个人主义者终极的目标是要超越所有的人,因此他无法忍受挫败或自己的领先地位被改变。他会拒绝承认这样的改变,并取消主动接触。如果需要的话,他当然也会为了保持领先而诉诸武力。接着他会企图建构一些令他满意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不论这些理由是否能够让他人信服。在白人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极致个人主义者也许会暂时承认较低的地位,以作为权宜之计,但是在国际关系中,极致个人主义者绝对无法忍受他的社会比别人落后。”^①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撰写的《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恰好可以做许氏此说的最佳证明。^②

这种情况也存在于美国对日本的关系上。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情况来看,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如美军占领初期接连发布以《神道指令》为首的各种指令和主导制定实施至今60余年来都未进行文字修订的《日本宪法》,在广泛的领域强力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而且还体现在经济等方面,如通过“道奇计划”“夏普税制改革”等积极促进日本接纳西方先进的经济制度。及至今天,美国仍然在以各种方式对日本进行着改造,如前所述近些年的日美之间每年交换的《年度改革要求书》实质上就是美国对日本的一种温和修理。当然,回顾战后以来的日美关系,美国对日本可谓既全心全意地扶助,又毫不留情地打压,美国对日本这种表面看起来很矛盾的行为,其实也正是美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特点在其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和行为上的必然表现。在美军占领日本初期,日本战时体制下蕴藏的各种矛盾随之爆发,并演化为一场政治危机和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这里所说的经济危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因生产过剩所导致,其直接原因是物资供给绝对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战败初期的日本政府一再更迭,处在一种疲于奔命的混乱状态;财阀企业面临着企业解体和领导人被整肃问题,人人自危,无暇顾及经营;普通国民是

^① [美]许烺光:《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第10—11页。

^② 该书探讨了美国权力精英为保持对世界的控制所做出的种种抉择,即如何维系美国世纪、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确立的美元体系。书中详细描述了美国怎样运用从秘密经济战争、人权“武器化”所演化出来的各种方法,来弱化和孤立他国尤其是中国。本书还阐述了美国赤裸裸地运用军事力量对付其唯一的战略核对手俄罗斯的真相,以及中国西藏、缅甸和苏丹达尔富尔在美国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遏制战略中所起的作用。参见[美]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吕德宏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中文版前言,第3—4页。

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战后失业、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生活朝不保夕。美国对日援助基本上是通过物资进口实现的,而进口物资又是通过美国控制的占领地救济援助资金和占领地经济复兴资金结算。美国的对日援助自实现占领之年就已经开始,截至1951年停止物资进口援助时止,共向日本提供了21.18亿美元的援助物资,占同期日本进口总额的39%。其中迄1948年末的援助额为10.58亿美元,占同期日本进口总额的70%,这是个相当大的比例数字,它表明当时日本的对外贸易完全是靠美国援助保持平衡的。可以想见,这种援助对濒临崩溃的日本经济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①美国加强对日援助,不仅帮助日本渡过了战后经济的最困难阶段,而且使日本由此走上了扩大再生产的道路。美国不仅向日本提供了物资、技术援助,而且还通过“道奇计划”“夏普税制改革”等在经济制度方面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加之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特需”拉动等,日本经济在1955—1970年实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成长,于1968年一跃成长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强国。

美国战后对日本的扶助可谓一心一意,但当日本因其经济的复兴、发展,出现了有损美国利益,或者威胁到美国地位时,美国打压日本也是毫不留情。例如,“早在50年代,欧美国家就对日本轻工业品的倾销性出口提出责难,要求日本节制,日本政府亦被迫在1957年做出对美国等棉纺织品出口自主限制的决定。60年代初,日本的钢铁、电视机、化学制品等对欧美市场造成冲击,再次遭致美国抗议。为此,日本政府又做出钢铁企业自主限制出口增量的决定。到60年代末,围绕日本纤维制品出口问题,日美之间展开了一场战后以来时间最长的艰难谈判。1970年9月20日,美国政府向日本发出通告,日本若在10月1日前仍不签署对美出口限制协议或开始以同意签署为前提的谈判,美国将从10月15日起单方面采取进口限制措施。面对美国强大的压力,日本政府赶在美国启动制裁措施的最后时刻即10月15日,签署了毛及人造纤维制品对美出口限制备忘录。1972年1月4日,日美两国又以该备忘录为基础正式签署毛及人造纤维协定”。^②

总之,美国在处理对日关系时,带有个人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无论是战后初期将日本视为改造对象时,还是20世纪60年代始提升为合作伙伴至今,皆是如此。

结 语

本文引进心理文化学理论的研究视角,通过对战后日美关系的剖析得出如下

^① 杨栋梁:《日本近现代经济史》,第236—256页。

^② 同上书,第359—360页。

结论:战后以来的日美关系是一种保护者与被保护者、控制者与被控制者、帮助者与被帮助者的关系,这既符合日本人“缘人”基本人际状态下亲子关系的特点,也是美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下寻求社会心理平衡的结果,导致亲子模式下美主日从的特殊关系因而能够延续至今。那么,今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相互依赖,美主日从”的日美关系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心理文化学理论认为,不同基本人际状态下的“心理社会均衡”结构模式不会轻易改变,但为了维持其心理社会的动态均衡,其构成要素的更换则会相对容易一些。日本与美国,不过都是彼此社会心理均衡模式的一个构成要素而已,若彼此能够继续保持基本功能的正常发挥,则亲子模式下的美主日从关系仍将会一如既往,反之,只要有一方功能弱化,这种关系就将难以为继。

所谓功能弱化,首先是指在基本人际状态相对恒定的前提下,彼此在对方“心理社会均衡”结构模式的位置仍存在被替代的可能。日美关系是一种从属式依赖,它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恰巧同时满足了日本人与美国人的心理需要。但美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在本质上与日本人并不相同,因此,在从属式依赖关系中,彼此的冲突也不会少见,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矛盾还会频繁发生。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如其他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美国国力的衰退,日本也不会甘于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假如日本国力增强,“下克上”的企图也会加强,就像过去日本从属于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一样。而且,从理论上讲,若将来出现了能够取代美国做日本人“亲分”的国家或更大的文明体时,日本即使无力独自做大,但仍可能与美国分道扬镳,与新“亲分”重构一种亲子模式下的关系。^①

其次,所谓功能弱化,是指彼此的基本人际状态发生了改变,如此则必然会影响亲子模式下美主日从关系的延续。基本人际状态这一文化结构比其构成内容有更持久的倾向,类似于生物基因一般不会轻易改变,但并非一成不变。例如,心理

^①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研究者从美国历史发展的轨迹,综合外部和美国国内因素,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后明确指出,“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在未来20—30年内不会动摇,美国的相对实力已经达到世界历史的顶峰,‘超更强’的局面不会出现。但是这个顶峰可以比喻为一座‘平顶山’,其上还有凹凸坑洼。至于美国在这座平顶山上能走多长时间而不致无可挽回地滑到下坡路上,现在的任何预测都是缺乏牢固根据的。应当避免根据一两年的事态发展或一两件重大事件,就得出美国将要从天顶跌落的结论。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在未来的10年左右赶上美国,但其综合实力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发展道路上有比美国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作为整体的新发展中国家尚不能对美国 and 西方世界形成足够有力的牵制,远不具备重塑世界秩序的实力和条件”。参见王缉思、程春华:《西风瘦马,还是北天雄鹰:美国兴衰再评估》,载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55页。2013年8月2—4日,日本NHK就现代日本人的“和平观”对全国20岁以上的男女进行了一次舆论调查,共设有12个问题,其中第11问是:你认为今后应该如何对待与美国基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同盟关系?在给定的6个答案选项中,选择“1. 应该在进一步加强”的占受访人数的26.3%;选择“2. 维持现状即可”的占49.5%;选择“3. 应该比现在再弱化”的占8.4%;选择“4. 应该予以解除”的占5.1%;选择“5. 其他”的占0.5%;选择“6. 不知道或者没有回答”的占10.1%。参见<http://www.nhk.or.jp/bunken/summary/yoron/social/pdf/130815.pdf>,2013-08-16。显然,目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够做日本“亲分”的国家,大概仍将是非美国莫属吧。

文化学用“缘人”概念来表述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把日本社会称为“缘人社会”,但近些年来日本社会却呈现出向“无缘社会”^①发展的倾向,以至于菅直人内阁时还特意成立了一个以时任官房副长官福山哲郎为组长的“包含每一个人的社会”特命小组来应对“无缘社会”问题。如果“缘人”的心理社会动态均衡模式向“个人”模式变化的趋势发展下去而使日本社会成为所谓的“无缘社会”,那么,从理论上说,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也会发生改变。若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出现这种状况,则受影响的恐怕将不仅限于日美关系,对东亚乃至世界格局都必将会造成重大影响。

本文的分析表明,日美关系的“美主日从”特点是日本获得安全感的重要来源,这暗示着,当日美关系模式发生变化或者世界出现了可能会影响这种模式的重大因素时,日本在行为上会有更明显的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例如,近几年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公开持续炒作“中国威胁”等,日本对中国崛起的种种过度反应或许能够从这个视角得到解释。

^① “无缘社会”,是因日本NHK2010年1月开始的以“无缘社会”为题的系列电视报道而被广泛使用的词,当年还被入选为新语流行语大奖前十名,NHK的系列报道节目荣获了“菊池宽奖”,相关内容也集结成书出版。(NHK「無縁社会プロジェクト」取材班:『無縁社会:“無縁死”三万二千人の衝撃』文藝春秋,2010年)从2011年1月起,《朝日新闻》也开始了名为《孤族之国》的系列相关报道,可参阅<http://www.asahi.com/special/kozoku/>,而且还出版了很多相关研究书,例如,橘木俊詔『無縁社会の正体:血縁・地縁・社縁はいかに崩壊したか』PHP研究所,2010年,等等。从日本的各种电视节目内容及研究论著所提到的所谓“无缘社会”现象来看,与尚会鹏所指出的日本社会第二阶段的个人化,即家庭、职场、地域、消费的个人化的社会现象基本上一致。尚会鹏称,日本社会第二阶段的个人化“还只是一定范围内的变化,只是出现了一些倾向,还不足以改变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参见尚会鹏:《日本社会的“个人化”:心理文化视角的考察》,《日本学刊》2010年第2期,但日本社会无缘化的情形似乎不容乐观。